



## 中评周刊 | 第 115 期目录

### 专题 | 大国文化自信，在意“洋地名”吗？

1. 葛剑雄：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 P. 2
2. 陈徒手：1965-1975：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P. 6
3. 李蓬国：“起洋名”未必是文化不自信，但“改洋名”肯定是 P. 14
4. 藕蚕：台湾如何改地名 P. 17
5. 张佳玮：论地名崇洋媚外？巴黎最需要整改！ P. 19
6. 夏建国、夏天墨：外国的中国地名 P. 25

### 观点文章

1. 盛洪：让数据产权自然生成，再加一把力 P. 28
2. 米塞斯：官僚体制导论 P. 32

### 随笔散记

1. 茅于軾：自由促进了财富的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P. 41
2. 臧启玉：我为什么要起诉腾讯？ P. 44
3. 王晓云：“这才是我的国”，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P. 49

### 读书

1. 洞主：《巨婴国》究竟讲了什么？如何评价这本书？ P. 53

### 审美苑

1. 向京：为什么要谈女性艺术？ P. 61

### 预告

1.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P. 66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8

## 葛剑雄：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

[ 葛剑雄 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本文节选自于 2017-12-08 大道知行知行堂《地名、历史和文化》。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葛剑雄教授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现在讲地名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们的时间意义和概念，因为从空间范围讲一个地名，无论点还是面，是通过地理坐标，用具体界限划定的。但是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其实都与一定的时间范围相联系，这个时间范围有的长有的短，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又与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联系，所以地名除它们的本意之外，还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义。

.....

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

### 更换地名的乱象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 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

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

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迁都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成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是历史上非常重要，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情况也有很多，也由此产生了很多后遗症。



北京长安街的路名，在文革是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  
地安门大街被改成了“总路线路”，文革动乱结束后，又都回复了原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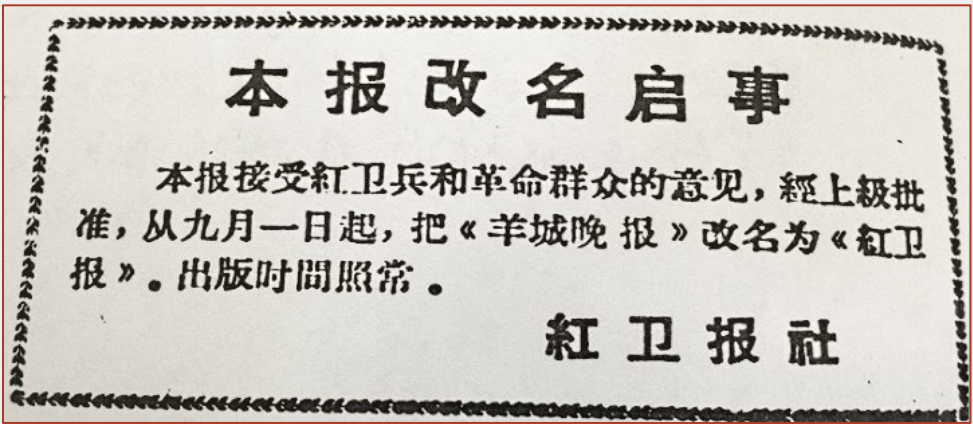
在行政区划调整中人为取消了不少旧地名，随意简化县级地名，甚至民政系统中间无法再登记原来的籍贯。我本人从小登记出生地为浙江吴兴县南浔镇。现在已经没有吴兴县，只有吴兴区。但吴兴区不包括南浔镇，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市南浔区。不过，吴兴这个从三国时就出现的地名总算保存下来了，而更多的古地名却消失了。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后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里，现在很多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的现象很可笑。其实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但频繁的区划调整、地名改变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人为制造很多矛盾。本来，大多数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要改通名就可以了，没必要改专名，但是为了表示是新地名，或者为了扩大影响，故意将专名更换。这不应该，也是很可惜的。随着一些专名的消失，跟它们有关的历史文化也将被湮没。

目前的行政区划名称也相当混乱。中国历史上曾经用过的行政区划通名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到用统一的名称代表一种区划？例如，市既可以代表省级的直辖市，也可以指地级市，还有县级市。我



们为什么不能下决心统一规划行政区划通名？非但没有做这项工作，还不断出现新的混乱，如“区”，已经有了省级的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和县级的市辖区，现在又出现了副省级的综合开发区、地级或县级的开发区、新区，还有矿区、城区、郊区。



文革中《羊城晚报》更名为“红卫报”的启示



“文革”中北京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

用景点名称取代政区名称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乱的又一做法。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为黄山。如今，外地人如果说去黄山，本地人就会询问你，是要到黄山山下去，还是去老屯溪。同样的，都江堰、井冈山等变成了政区名，很容易与真正的景点混淆。

用景区名取代原来政区名称的一个理由是：改名后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增加地方收入，这种说法完全是欺人之谈。如张家界，要是没有被确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投入，仅凭改一个名，就能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吗？商业因素的冠名做法，也是地名更换的一大原因。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并不反对适当采用商业冠名的形式改变地名。而前提应该坚持原有地名必须保留。现在往往因为商业利益，永久性把地名改掉了，不应该也不合法。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出资的多少，确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而不是永久性的改变。

一些外国地名在中国的滥用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国使用外国地名，我并不赞成，适当使用外国地名是可以的。比如，已经成为当地历史的外国地名应该保留，在一些开放城市适当增加一些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的地名也并无不妥。但将一些地方命名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外国地名，不仅缺乏严肃性，还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随意把别国地名拿过来命名景点、小镇，侵犯了他国的地名使用权。而滥用外国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价值观念混乱，或者高估这些外国地名的价值。例如，一些新建的楼盘、新开发的小区钟情于使用外国地名以显示档次，这种做法，地名管理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

在文化大革命中破旧名立新名战果表							
新名	旧名	新名	旧名	新名	旧名	新名	旧名
工农兵东大街	张自忠路	育红路	景山西街	代代红路	景山东街	南昌路	景外大街
工农兵西大街	地安门东大街	长征路	景山后街西段		景山后街东段	四新路	佟麟阁路
人民公社路	德胜门内大街		原无名(西大壁路往东至通县)	大跃进路	安定门内大街	新文化街	石驸马大街
向东路	车公庄大街东段	总路线路	地安门内大街		交道口南大街		鲍家街
向群路	车公庄大街西段		地安门外大街	首创路	大佛寺西大街	反帝路	东交民巷
红旗路	新街口南大街	宇宙红路	百万庄路东段		美术馆东街	反帝西路	西交民巷
	新街口北大街	光辉南路	西大壁路南段	光辉路	西大壁路北段	碧山路	府右街
	西四北大街	红卫东路	珠市口西大街	红光路	珠市口东大街	中华路	慈登堡路
	白石桥路						
文革路	中关路						
	海淀路南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破旧名立新名战果表”，意图解决“地名不详”、且混乱不堪的“战果”

我经常问学生，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只告诉我是某市人，只讲到“地级市”一级。我问是哪个县（区），他们才告诉我。为什么不说全？他回答怕你不知道。介绍籍贯的传统做法是到县一级，如果不这样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将会越来越贫乏，地理知识不仅需要在课堂上的学习，它的传播和巩固还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如果，我们接触地名越来越单一、笼统，势必造成大家地理知识越来越贫乏。

总而言之，我感到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因为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地名资源能够为我们今天和今后所用。 ■■

[【返回目录】](#)



## 陈徒手：1965-1975：北京地名修改内情

[ 陈徒手 本名陈国华，《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本文转载自 2019-6-24《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陈徒手

### 1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 年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 1951 年 12 月 19 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 年 2 月 10 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 2 月 22 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 25 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 28 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

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 2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惧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

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 3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東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



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 4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

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黄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喜报胡同”，等等。

## 5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

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文革初期，北京苏联驻华使馆所在街道原名“扬威路”（也曾叫“友谊路”），被改名为“反修路”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

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与苏联使馆仅隔一墙是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也随之更名为“反修路中学”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下放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 6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



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 86 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 年 11 月 14 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的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 1974 年 11 月 18 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 519 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 389 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 14 条。1975 年 11 月 14 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

[【返回目录】](#)

## 李蓬国：“起洋名”未必是文化不自信，但“改洋名”肯定是

[ 李蓬国 媒体评论员。本文转载自 2019-06-21 微信公众号：lipengguo123。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针对近期在各地引发热议的更改“大洋怪重”地名一事，6月21日，民政部作出回应，称个别地方也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是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施，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6月21日中国新闻网）。



维也纳酒店集团遍布全国 80 个大中城市，在全国拥有 300 多家分店



“阿里巴巴”冠名源自阿拉伯阿拉丁的故事

近日来，“酒店取名维也纳是崇洋媚外”“‘曼哈顿’楼盘改名‘曼哈屯’”等改洋名事件引发广泛争议。我以为，“起洋名”未必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但“改洋名”肯定就是。

改革开放后，一些企业、商家掀起“起洋名”的潮流，“阿里巴巴”“维也纳酒店”等均属此列。对这种起洋名、傍洋名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文化不自信，也可理解为积极融入国际市场，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倘若认定这是“崇洋媚外，伤害民族感情”，那么，首先就应该要求阿里巴巴改名，因为它的国际影响力最大。

就维也纳酒店而言，既然它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的，就有使用该商标的合法权利，地方部门的行政命令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责令其改名。海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石清理回应称，“维也纳酒店”是商家注册的商标，此次清理整治的内容是地名标识，而非商标，同时，商标也不能延伸为地名标识。

“也就是说，商家使用这个商标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把地图上的地理位置写成维也纳，这是需要清理整治的内容”。

既然知道维也纳酒店是商标，不是地名，就不应该将其列入“不规范地名”的名单，这是正常的逻辑。至于“商标可以用，地图不能标”的要求，更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维也纳酒店的商标能用，凭什么就不能在地图上标出来？假如一个外地游客到海南，要入住该酒店，但在地图上查不到，只能看到“有家客栈”“龙门客栈”（因为连“酒店”也是舶来词，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只能改为“客栈”）。试问，他怎么知道究竟哪个才是维也纳酒店的“马甲”？这难道不是脱裤子放屁，为民添堵吗？



温州的欧洲城“规范”为“矮凳桥小区”，曼哈顿“规范”为“曼哈屯”

关于温州市一楼盘名由“曼哈顿”改成“曼哈屯”一事，温州市民政局解释称，该楼盘审批时的标准名称即为“曼哈屯”，后开发商对外出售时打出“曼哈顿”的旗号。也就是说，此事属于误会。可是，按照六部委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即便真的出现“曼哈顿”改名“曼哈屯”，



也在情理之中。

上述文件明确了“列入清理整治范围的不规范地名认定原则和标准”，共分为4个类型，其中第二类为崇洋媚外的“洋地名”——包含外国人名、外国地名，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但历史上已经存在、具有纪念意义或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地名，地名用词含义符合汉语用词习惯、符合有关规定的除外，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列宁公园等。认定原则和标准是含有外国人名、外国地名或其简称，容易造成误解的地名；直接用外文命名的地名和用外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

按照上述标准，“维也纳酒店”“曼哈顿”楼盘，均为被整顿的对象，因为它们就属于文件所说的“用外语词汉字译写形式命名的地名”，地方部门的理解没有丝毫偏差。也就是说，地方部门完全是按照文件精神执行，并不存在“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确”“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的情况。明明是上级文件有纰漏，却怪下级部门“理解不准确”，本质是一种甩锅行为。

再说，这份整治不规范地名的文件，本身就有不够“规范”的地方。该文件把“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理解为“地名”，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属于“过度阐释”，已经“随意扩大范围”。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无论居民区、建筑物取什么名字，都不能理解为“地名”。比如某地的维也纳酒店或曼哈顿小区，它的地理位置（“地名”）应该为“某某大道（巷）多少号”。倘若仅仅因为觉得某个小区的名字“洋气”，就要改名，那么，必然给群众增加诸多麻烦，比如更改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等。

“改洋名”的做法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道德臆想为判断，不是以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为考量，而是以“办公室论道”为决策依据。这种脱离实际的决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而是给群众添堵，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回顾历史，大唐盛世海纳百川，源于深度的国力自信和文化自信，并不担心自己被“洋化”。放眼当下，美国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与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世界霸主的地位密不可分。说到底，文化自信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提升综合国力才是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之策。

总之，“改洋名”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增强文化自信是必须的，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和精神胜利法。

地名是民众情感和历史记忆的载体。更改地名是需要全社会参与讨论的大事。台湾“五都改制”，先后经议会表决、社会各界讨论、公开征名、网络投票、学者审查，历时一年半，方最终确定地名。由这一系列程序，我们可以学到，政府在合并区划、变更地名的行政决策过程中，应当如何尊重民意、尊重历史。 ■■

[【返回目录】](#)



## 藕蚕：台湾如何改地名

[藕蚕 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2010-08-13 中评网，图片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2008 年年初，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三都十五县”的行政区划改革规划，拟将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台中县市、高雄县市、台南县市分别合并，舆论称为“五都改制”。2008 年 9 月，台北县议会第 16 届第 13 次临时会议第 5 次会议通过了县改市的改制计划书。由于台湾已经存在名为“台北市”的行政区划，台北县升格后不可与之重名，必须改用新地名。改制计划书将新城市名暂订为“新北市”，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新地名。半年间共征得新北市、北部市、北都市、大河市、兴北市、北县市、大台北市、北台市、海山市、环北市、台大市、台湾市、富礼市、板桥市、美河市等多个名称。2009 年 4 月 30 日，台北县县府研考会将征得的地名悉数放到网上由民众投票。“新北市”一名得票最高，县府遂决定采用这个名称。而采用“新北市”地名的改制计划书草案，也经县政会议、县议会审议通过，报台湾“内政部”核定。

“新北市”定名后，部分社会舆论认为“新北市”地名用台语念很像“新白痴”，闻之不雅。对此，台北县长周锡玮解释道，“新北市”是经由民意及县议会审查通过而定，他当然尊重民主程序选出来的名称，也没有听闻“行政院”对这个新名称有什么意见。而台北市长郝龙斌则对这个地名表态支持，他说，只要是多数民意认为好的名字，他乐观其成。

台中市议会讨论改制后新名称时，多位市议员认为应维持使用了一百多年的“台中”，合并后可称

“台中市”或“台中都”。最后呈报“行政院”的“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建议书”，则载明合并后的地名为“台中市”，多数民众希望尊重历史的记忆，维持“台中”的原地名不变。



根据高雄县市合并改制计划书，未来高雄县市合并后，仍称为“高雄市”，而未来高雄县二十七个乡镇将全部改为“区”，村则改为“里”，合并后的市政中心及市议会则暂定为高雄市政府及高雄市议会。

2009年6月23日，台湾“行政院”召开市县升格改制审查会议。审查小组委员共25人，由机关代表10人，各领域学者15人组成。经过15小时的马拉松式审查，最终通过了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改制案。（台南县市合并案在当天会上未达成共识，会议决议报请“行政院”决定。）

台湾“内政部”次长林中森对改名一事表示，基本上会尊重地方政府改制计划书中所提的名称，虽然最后还是要由“行政院”核定，但应该不会改变。他说，名称是各地方议会决议通过的，具有民意基础与共识，“推翻了可能问题更大”，且在改制审查会中，完全没有审查委员就建议改制的直辖市名称提出异议。

地名是民众情感和历史记忆的载体。更改地名是需要全社会参与讨论的大事。台湾“五都改制”，先后经议会表决、社会各界讨论、公开征名、网络投票、学者审查，历时一年半，方最终确定地名。由这一系列程序，我们可以学到，政府在合并区划、变更地名的行政决策过程中，应当如何尊重民意、尊重历史。 ■

[【返回目录】](#)



## 张佳玮：论地名崇洋媚外？巴黎最需要整改！

[张佳玮 80 后作家，代表作《倾城》。本文转载自 2019-6-24 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本文作者张佳玮

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因为洋大怪重、宣扬封建、崇洋媚外，许多地名要整改。

我听到的一种意见是，这跟文化自信大有关系。

既然文化自信可以通过改地名来立竿见影地提高，我当然很是高兴。比如，我有位四川同学，父亲是从商的，很讲名字吉利不吉利。结果她从小到大，名字换了四次——虽然她自己很不乐意，还说那个起名字的先生是“歪（第二声）先生”，但似乎她爸爸的生意一路顺风顺水，我想，一定是改了名字起了巨大作用吧？

所以，大概，整改地名也确实能提高文化自信吧？

这里，我就要举一个典型反面教材了：

像法国巴黎，虽然是法国首都，但地名就乌七八糟，很值得吐槽一番。

至于整改不整改，就看他们自己的了。当然，法国人自己没有文化自信，那自然是他们自己活该，我们也犯不着提携他们。

首先，封建色彩。

比如协和广场到马德莱娜大教堂之间那条路，就叫 Rue Royale，皇家路。这是公然宣扬封建，当然要不得。

香街上面还有家店，叫 Royal Hotel，皇家酒店，那自然是更加不行的。

巴黎 1 区，有一处叫 Palais-Royal，皇家宫殿，这名字不但封建，还有吹嘘之嫌——这地方最早，不过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官邸，后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住过。所以这里其实该是宰相府更对——当然也要整改。



还有歌剧院旁的旺多姆广场，肖邦就在那里逝世的——旺多姆是个什么人？旺多姆公爵嘛。虽然 18 世纪初那一代旺多姆公爵曾为法国建功立业，跟英国史上最好的陆军将领之一马尔波罗公爵大战过，但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将军了。特意用他起个地名，这算什么呢？我们也没有搞个戚继光广场、常遇春广场，来纪念他们的战绩嘛。巴黎凭什么这样呢？整改！

当然，有一说一，有些地方，也不是他们刻意搞封建。比如在香街旁面对面的大皇宫和小皇宫 Grand Palais et Petit Palais，其实法语原文里没有皇字，就是大宫和小宫——都是为了 1900 年世博会建的。不算封建。

但大小宫旁边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自然要批判一番了：虽然是巴黎最华美的桥，但当时起这个名



字，是图什么呢？是致敬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那时他跟法国缔结了同盟。

一个法国首都，在荣军院和总统府之间，建个俄罗斯沙皇命名的桥。这真是既封建，又媚外，当然很不合适了，特别需要整改一番。



好，既然从封建说到媚外了，那就得说一句：

巴黎的地名，媚外问题也很严重，亟需整改。

比如，巴黎 13 区府所在地的广场，叫做 Place d'Italie：意大利广场——一个巴黎的广场，叫啥子意大利广场呢？说出来特别惹人误会。这是媚外。

而且还涉嫌刻意夸大，一个区府所在地，叫什么意大利广场，真是吹没边了。亟需整改。

意大利广场旁边有个地铁站，叫 Maison Blanche 站，因为那地方有个酒店就叫这名字，白楼酒店——而 Maison Blanche 的英语意思是：白宫。

您看，一个法国地铁站，叫白宫。这既媚外，又夸大，两罪并罚，一定要改。

刚才说到大小宫，就在香街边上。大小宫两边，有法国自家总理克里蒙梭和自家总统戴高乐的雕像，也还罢了；旁边却还有尊玻利瓦尔的雕像——人玻利瓦尔解放拉美，跟你有啥关系？立他雕像干嘛？

哪位会说，拉美解放者除了玻利瓦尔，还有个圣马丁呢？没事，他也跑不了。南边大学城花园里，也立了他的雕像。法国人在自己国家搞许多拉美英雄雕像？典型的媚外嘛。



最媚外的，还得是香街。香街上有一个地铁站，叫富兰克林·D·罗斯福站；旁边一站，那就是乔治五世。香街也算个凑合的购物街，结果一个地铁站是美国总统，一个地铁站是英国国王。那真是连媚外带封建，毛病占齐了。怎么可以不整改呢？

还有地铁站叫圣彼得堡站，叫斯大林格勒站——英美苏都不放过，媚外媚得没有边际了。

您大概也发现了，法国人给街起名字，爱拿人名说事。

如果只是拿自己家的名字，搞点拉格朗日路、列维·施特劳斯路，那就算了。

但光平时跑步，我就看得到卡萨尔斯路（西班牙大提琴家）、爱迪生路（我们都知道他）、但丁路（我们都知道他）、居里夫人路（我们都知道她）……就差把外国名人都拿来拉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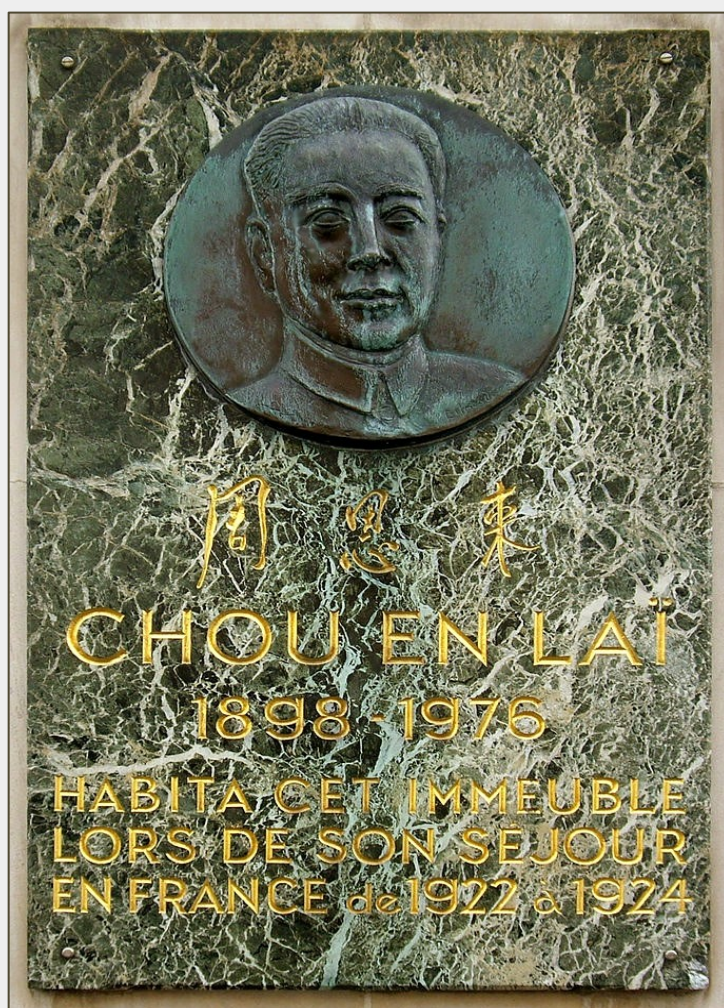
一个法国首都，却拉一大堆外国名人做路名。这就显得巴黎人毫无文化自信，非常崇洋媚外了吧？



自然要好好整改一番，把这些外国人名都拿走了，巴黎才能清净，才能拿回文化自信。

当然，巴黎这么把全世界都拉过来、献媚全世界，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比如，20 区有个街叫 Rue de la Chine，中国街。



有条巷叫 Passage de Pékin，北京胡同。

这时候，我就稍微有点犯难。

该说巴黎人是没有文化自信呢，还是该说他们识相呢？

刚才说到那个亟需整改的意大利广场，旁边有一处楼。

法国人没把这里起路名，却认认真真立了牌子，雕了像，刻了名。

以纪念一位曾在这里住过的、我们都熟悉的、敬爱的中国人。

近来跑步经过，看到这个，我会停下来看两眼。

除了心里持续吐槽“雕得也不太像啊，真人比这个帅多了”，偶尔也忍不住，换个角度想：法国人搁这个在这儿，算是媚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媚中）吗？

所以，是否有这种可能？

搞那么多外国名字，设那么多纪念，可能也不全因为巴黎人崇洋媚外、宣扬封建、没有文化自信。

也许里头真有那么一点，是对历史上已有的理想人物或人类成就，抱有一点点朴素的敬意和向往呢？

电视剧《金婚》里，柴鸥老师扮演的角色，每到一个时代就改个名字：先叫方卓雅，又叫方红兵，再叫姚爱伦——看着是很浮夸，但好像，也能体现出对时代潮流的追逐，以及，自己的理想？

虽然贱名好养活，大家都起朴实的名字，会显得接地气；但起名字朝大了起，好像也可以算是，许多起名者的某种期望？

也许那里头透着文化偏差，透着好高骛远，就像当年某小品里的苏格兰打卤面，透着浮夸搞笑；但好像罪过也……没那么大？

上面提到的，这位被法国人尊敬着的、我们敬爱的中国人，说过这么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

后面不说了，我们都知道。 ❷

[【返回目录】](#)



## 夏建国、夏天墨：外国的中国地名

[ 本文转载自 2019-6-23 夏家少爷微信公号，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这几天正在全国整治不规范地名，其中整治崇洋媚外的“洋地名”——包含外国人名、外国地名，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是一项重要内容。

国人有崇洋媚外，国外也有崇中媚外。国外用中国人命名的地名几乎遍及全世界。至于国外遍地开花的中国餐馆，都用中国各地命名，比如川菜，湘菜等等随处可见，甚至店招上写的都是中文。



美国纽约林则徐街

担心各国也可能发起不规范地名整治活动，特地百度了一下，把各国这些用中国人命名的地名罗列如下，如果改了，也好做个纪念：

美国纽约：林则徐街。

2005 年 6 月 26 日国际禁毒日这天，纽约市政当局将华埠东百老汇街命名为“林则徐街”，我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参加了揭牌仪式。

塞尔维亚：孔子大街。

2016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政当局，将中国前驻南联盟大使馆所在的那条街改成“孔子大街”。

印度加尔各答：孙逸仙街、鲁迅路。

孙中山去过加尔各答，所以本地人为了纪念孙中山命名为孙逸仙街，不远有条鲁迅路，怎么想起要取个鲁迅路，目前不得而知，此地现在是加尔各答的唐人街。

新加坡：李白大道、杜甫大道。

这对兄弟在国内还没有并列在一起的机会，在新加坡终于可以长相依了。



新加坡的李白街



南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蒋介石大道

巴拉圭亚松森：蒋介石大道。

整条街长四百米，街道中间还有蒋介石塑像，左翼曾经要求把名字改了，到目前没有改成。

莫桑比克马普托：毛泽东大街。

该路有长两公里，最好的地方是，和毛泽东的导师列宁、马克思相隔不远，附近还有列宁大街和卡



尔·马克思大街。三位巨人，聚首莫桑比克。

吉尔吉斯比什凯克：邓小平街。

1997年6月18日命名，长3.5公里。还特地立了一块碑，上写“此街以中国卓越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邓小平的名字命名”。

除了用人名的，还有用地名的。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北京大道。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北京大道。

新加坡：上海路。



马来西亚檳城的中国大街

马来西亚檳城干脆直接把中国当成街道名，称为“中国大街”，而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市在新市区给一条街道直接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街”。

以上罗列只是世界各地极少的一部分案例，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在国外一切安好，不要被崇中媚外的名义整治掉了，否则也太没有了自信。 🇨🇳

[【返回目录】](#)



## 盛洪：让数据产权自然生成，再加一把力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 2019 年 1 月 18 日在“新经济沙龙”的发言。中评周刊首发 ]



本文作者盛洪

许可刚才讲的欧盟与美国在数据产权上的不同态度——欧盟试图给个定义，而美国想“以合同方式回避数据权属问题”，恰恰反映了它们的法系背景的不同。欧盟的背景是欧洲大陆法系，而美国是普通法系。大陆法的哲学背景是欧陆哲学，强调思辨和演绎，强调对物的所有权，是 ownership，是一种对物的绝对所有权。而普通法的哲学背景是经验主义，它所说的产权，property rights，是一种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这种行为一般是会给人带来利益或成本。如果行为不对成本或收益产生影响，就可以不在考虑之列。对于数据产权也是如此。如果数据产权对人的利益没有影响，就大可以不必考虑。这样做，可以简化问题，不去关心数据和信息的区别。

普通法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而是从习惯出发的。普通法就是对习惯法的提炼。习惯最初就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首先是相邻的人互相承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后来被普通法法官发现了。普通法法官可能会碰到土地归属问题，他就找 12 个邻人去确定这块土地到底归谁，一旦出现

这种纠纷，过去是怎么处理的。实际上他是在吸纳由习惯而成的那种产权，最后通过普通法对习惯法的规则元素提炼，形成产权概念。这种产权概念包括了人类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它有用有价值。假如没用没价值，就没有任何意义，普通法不考虑物的实体到底怎么回事，它性质是什么，它如何定义。所以刚才许可介绍得非常好，普通法避免了很多问题，它不去讨论数据到底怎么定义，或者信息是什么样的，没有意义。不管这个数据是什么东西，管的是它对我的收益和成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问题。

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就是在普通法背景下产生的。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结语中谈到，“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这就是普通法对产权的理解。按照张五常对产权的解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使用权，一是收益权，一个是转让权，这三个权利已经足以表达产权的含义。而这三个权利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行为——使用、收益、转让——的权利。所以在产权理论中，不同产权没有高下之分，没有在欧陆那种绝对所有权和最终所有权，即要支配其他权利的权力。所有权利都是由合约来划定的。当然随着产权的发展，会有些权利确实不能仅靠民间合约来确定和保护。当出现产权纠纷，当合约不能达成的时候，可能两方争论半天，谁都不同意谁，这时候需要有第三方裁决，尤其是一种强制性的第三方裁决，一般要由政府来介入。政府介入的时候，就要给出一个产权界定，到底这块地归谁？这个权利归谁？最后上升为所谓国家法。

从习惯上升到国家法是普通法发展的一条道路。但国家法不是任意的。上升到国家法必须要发现合理的产权规则是什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中虽然说法官可以任意裁决，就是国家可以任意裁决，裁决后可以自由交易，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交易仍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但科斯的真正结论是，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所以法官任意裁决就是不对的，法官应该尽可能的实现最公正的裁决，使得这个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从习惯上升为国家法，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法如何去仿效习惯法或者从习惯法中提炼出的公正原则的问题，这是核心。这个核心又和柯克和哈耶克讲的非常一致，他们说，议会不能创造法，只能发现法。普通法的国家法不是任意的，它一定是要仿效习惯法所内含的那些公正原则形成的。

再进一步，就是从有形物品的产权走向无形资产的产权，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这是一个人类的创造。知识产权肯定不是一个完全自发形成的产权，但是它又是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发展和形成的。刚才讲到中国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尤其从宋以后，大概到明清，中国出版业是非常发达的，例如大家知道的明清小说。冯梦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后来到一个地方当县官，他根本不担心有钱没钱，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版税。在中国传统中版税的形成也是通过合约的，但是它有很多方法，包括出版商有什么方法去界定它的产权，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裁断，我记得邱澎生大概讲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最先也是由合同或某种商业秘密形式，是通过某些技巧来保证的。

比如说当时雕版印刷，某个版本跟别的版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版本字特别好看。这套雕版其实是个边界，别人要做这样一套书，是成本很高的一件事。为什么当时有活版印刷，还要保存雕版印刷，在明清时候都是雕版印刷，可能背后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些技巧。但是无论如何最后形成的那个知识产权，它实际上使得出版商没有必要用这种技术去保护他的知识产权，这实际上还是促进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创新，以及知识创造的那种扩展，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应该说知识产权还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产权，它跟土地是不一样的，土地边界很清楚。知识产权在民间不能够完全自动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被复制，复制的成本太低，反过来讲就是它的排他成本太高了，个人去做排他的事，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要靠政府，尤其是全国那么大地方。所以这是知识产权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新经济的产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自发生成的产权过程，这种产权过程是合约的互动。为什么可以这样？第一，产权的生成最先是合约互动，而不是先有法律界定的。第二，这个社会已经确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以后，它对于互联网经济就是一个前提了，是一个外在环境了，它不需要重新创造。比如说最开始的软件的版权等都是延续的、延伸的，所以这些是知识产权体系自动的就会保护互联网的一些知识产权。所以最开始互联网就有知识产权制度的这样一种环境。对于互联网下的人们来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现成的外在环境，他们之间就在那互动，然后形成合约。以前跟阿里研究院的人聊，他们说通过互联网上的卖家和买家之间的互动，大概 99% 以上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质量问题、退货问题、合约不清等方面，都是在互联网上自己解决，很少通过诉讼解决。

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合约就是互联网中人们互动制定的，当然首先可能是像阿里、京东来制定的，但他们制定时也会考虑买家或被服务方的想法，所以肯定也在互动。包括阿里对规则做了稍微的改动，就会遭到反抗，之后阿里会退一步，其实这都是在互动。而形成这种东西的基础，就是这些权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如果侵犯我的利益，我就要作出反应，甚至要反抗或者要抗议等等。它反映的是人的行为，就是人的行为的权利，到底互联网上是数据还是信息，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按照普通法的概念，按照产权的概念，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到底给我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给我增加了多少成本，这是一个非常核心问题。

但是进一步在互联网上就发展出一些过去没有的东西，比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播等自媒体。微博过去没有，现在有了，一个微博可能多达上千万粉丝。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在上面打一个广告，那值多少钱？无论你说微博是什么，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它有它的产权，发展出了产权。我使用它，集聚了大量的粉丝，这大量粉丝其实就是我的收益。无论我现在收钱不收钱，后来有赞赏制度，一个微博账号只要有粉丝，毫无疑问它就有正的经济利益，其实这就是产权的前提。当然在这基础上，别人也可以转，为什么你可以转这个微博呢？因为微博内容的价值和转发相关。我们经常说一个信息会产生价值，但是价值有一半是生产者的，一半是传播者的，这是等价的，因为转发可以增加你的知名度，带来



新的粉丝。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互联网上大量这种新的形式的出现，一方面它受到了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所以它自然就延伸了；一方面它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

大概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可能比较受保护的是那些已经有明确的法律制度的一些形式，像软件、文章等等。但是，尤其在政府层次，还没有对这些新产生的形式与像对待正常产权那样平等对待。不知道哪天可能就会把微博关掉，关了是什么含义？关掉就是经济损失。比如茅老师有 2000 万粉丝，我们是可以算出经济价值的。在互联网上不用关心什么形式，你集聚了人群，就有经济价值，这说白了就是有产权。但是因为不是传统的受保护的一种产权形式，所以经常会被关掉。这和关掉一个企业是一样的，这个企业给我带来利益了，你不能随便关。政府当然可以有权力关，前提是如果它违法的话，但要证明它违法也是有正当程序的，被关的这个企业也有权利去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而现在关掉一个微博既没有行政当局履行法律正当程序，被关的博主也没有通道申辩和保护自己的产权。所以确实要把这些财产当成财产，才能去保护这些新出现的财产形式。

还有一种形式的产权问题。有一个日本电视剧，讲的就是网络的虚拟财产和现实中的人的对应关系。它讲得很极端，比如这有一个网站或者账号，它有个虚拟人物在上面，整天在那说话，有很多粉丝。后来人们发现虚拟人物有些微妙的不同了，原来虚拟人物的主人被杀了，然后被新的人顶替了，顶替的人拿到了收益。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种网络的虚拟财产跟现实中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隐蔽下来的，不像比如我这房子是我住的，这个东西是我拿的。但这也是一种对产权的侵犯，产权与其所有者的关系不明确，这是它的弱点。产权所有者跟网络虚拟财产这个概念很好，网络虚拟财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那么强，它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我想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网络信贷的出现产生的一些问题，可能都要去解决。我觉得这可以有很好的讨论余地。

最后我评论一下张曙光老师关于“使用权”的思考，我觉得这个命题非常棒。我们有一种教科书式的对产权和所有权的理解，因为中国人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ownership 概念，那个概念是大陆法系的结果，它是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继承着黑格尔的那条演绎的，绝对的物的所有权概念。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真正起作用的是使用权。包括很多的产权的演变。一个很著名例子就是英国的土地，英国土地所有权就是威廉大公后代的。事实上过去是土地保有制，土地上的老百姓是农奴，连自由人都不是。但现在大家知道英国土地是国王的，但是实际的产权是英国老百姓的。所以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正像张五常说的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是核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让它上升为国家法。不然的话即使你有了这几个权利，但是如果国家法倒过来，这三个权利是不能真正受到保护的。按照普通法的思路，有这些合同形成的习惯法以后，通过普通法上升为国家法，国家法上升为宪法，再反过来去保护使用权。 🍷

[【返回目录】](#)

## 米塞斯：官僚体制导论

[ 米塞斯 20 世纪著名经济学家, 历史学家, 哲学家, 奥地利经济学派核心人物。本文节选自路德维希·米塞斯《官僚主义》。冯克利译,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中文版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 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1881.9.29—1973.10.10 ]

### 1. “官僚”一词的贬义

“官僚”、“官僚的”和“官僚制度”，显然都是贬义词。没有人自称“官僚”，或把自己的管理方式称为“官僚”管理。这些字眼在使用中总有骂人的意思。它们总是意味着对人、机构或各种办事方式的蔑视和批评。没有人怀疑，官僚制度一无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不应有它的立足之地。

这些说法具有贬义，并不限于美国和另一些民主国家。它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普鲁士，这个专制主义政治的杰出典范，也没有人愿意被称为官僚。普鲁士国王的 wirklicher geheimer oberRegistrationsrat (最高枢密院顾问) 为授予自己的尊严和权力而自豪。他对下属和臣民尊重自己趾高气扬的态度而高兴。他陷在自己既重要又无谬误这种想法中不能自拔。然而，假如有人傲慢无礼地把他称为官僚，他会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侮辱。在他本人看来，他不是官僚，而是文官，这是他的威严所在，他是国家的官员，始终不渝、日以继夜地关怀着全体国民的福祉。

值得指出的是，批评官僚体制的人认为，“进步人士”要对官僚体制的扩展负责，可是这些人并不

想维护官僚体制。相反，他们同那些在另一些问题上被他们视为“反动分子”的人一起谴责官僚体制。例如他们坚信，官僚的统治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乌托邦的本质。他们说，官僚体制是资本主义体系在试图缓和自身消亡的无情趋势时采取的一种差强人意的手段。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最终胜利，不但会消灭资本主义，也会消灭官僚体制。在明天的幸福世界里，在实现了全面计划这一福音的天堂里，不会再有任何官僚。普通人就是最高首长，人民亲自照料自己的所有事务。只有头脑狭隘的资产阶级才会陷入这样的谬论，认为官僚体制是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的东西的预演。

可见，大家似乎都同意，官僚体制是一种罪恶。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没有人曾做出尝试，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说明官僚体制的确切含义。这个词被漫不经心地使用着。如果要求人们提供一个准确的定义和解释，大多数人都会不知所措。如果他们不清楚官僚体制和官僚的含义，他们怎么能够谴责这种现象呢？

## **2. 美国公民对官僚主义的指控**

假如让一个美国人具体解释一下他对有增无减的官僚化的抱怨，他也许会这样说：

“我们美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分立上，是建立在联邦和各州管辖权的公平划分上。立法者、最重要的行政官员以及许多法官，是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即选民，才是至高无上的。此外，政府的这三个分支，都无权干涉公民的私事。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是自由人。

“然而，多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新政以后，一些强大的势力试图用一种不负责、肆意妄为的官僚体制的专制统治取代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制度。官僚进入政府，不经选民的选举，而是由另一些官僚任命的。他篡夺了很多立法权力。政府的各个委员会和官僚部门颁布政令和法律，管理并指导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不但插手过去一直留给个人决定的事情，甚至毫不迟疑地颁布一些政令，从本质上说，它们等于废除了经正当程序而生效的法律。官僚部门利用这种准立法手段篡夺权力，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事务之优劣的判断，也就是说，以十分任意的方式，决定许多事情。官僚部门的统治和裁决权，又被联邦官员所加强。名义上的司法审查变得形同虚设。官僚们每天都在获得更多的权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主宰整个国家。

“毫无疑问，这种官僚体制从本质上说是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的，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违背宪法的精神和文本，是在复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方式。它狂热地敌视自由创业和私有财产。它窒息了工商业活动，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漫不经心的开支，糟蹋着国民财富。它是无效率的和浪费的。它标榜计划，可是它根本没有明确的计划 and 目标。它缺少统一与协调。不同的官僚部门和机构，为了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工作。结果是整个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机制的解体。贫困和痛苦必然随之到来”。

大体而言，对官僚主义的这种严厉指责，是对美国政府目前趋势的恰当描述，然而它并没有触及要害，因为它认为官僚体制和官僚要对一种变化负责，而这种变化的原因必须从别处寻找。官僚体制



不过是一些有着更深层根源的事物与变化的结果和表征。

目前政策的特点，是用政府管制代替自由创业的趋势。强大的政党和压力集团，强烈要求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公共管制，要求实行彻底的政府计划，要求工商业的国有化。他们的目的是政府全面控制教育和医疗专业的社会化。对于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无不打算使其服从当局的统治。在他们眼里，国家管制是消除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

这些全能政府的热情倡导者，在赞扬他们自己在极权主义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时，倒是十分谦虚。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它是历史发展必然的、无可逃避的趋势。他们同卡尔·马克思一样坚信，“由于一种冷酷无情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注定来临，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利润体系注定消亡。“未来的大潮”将把人们带向政府全面管制的人间天堂。极权主义的鼓吹者自称“进步分子”，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理解了各种潜能的含义。他们嘲笑和蔑视那些试图抵抗各种因素——如他们所说，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阻挡它们——的人，把这些人称为“反动分子”。

由于这些“进步分子”的政策，各种新的政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官僚的数量成倍增长，令人忧虑地蚕食着公民个人的行动自由。许多公民，即那些被“进步分子”诅咒为“反动分子”的人，厌恶对他们的事务的侵犯，指责官僚的低能和浪费。可是这些反对者历来仅仅是少数人。这从他们在以往的选举中无法获得多数票即可得到证明。“进步分子”，自由创业和私人开拓精神的死敌，狂热鼓吹政府管制工商业的人，打败了他们。

事实上，“新政”中的政策一直得到选民的支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假如选民不再赞成这种政策，它是会被彻底放弃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宪法仍然完好无损，选举仍是自由的。选民在投票时没有受到强制。因此，说官僚体制的获胜是利用了非宪法的、非民主的方式，是错误的。法学家对某些次要问题提出的疑问也许不错，不过就整体而言，新政有国会为其撑腰。是国会在制定法律和拨款。

.....

批评官僚体制的人，把攻击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一种表面现象，却没有对准罪恶的根源。主宰公民经济活动的无数政令，是直接来自于国会正常通过的法律，还是来自于得到法律授权和拨款的一个委员会或政府机构，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真正抱怨的，是政府实行这些极权主义政策的事实，而不是制定它们时采用的技术性程序。就算国会没有授予这些机构伪立法的职能，而是把这些职能所必需的颁布一切政令的权利依然保留给自己，这也没有什么不同。

一旦宣布价格管制是政府的任务，无数的价格限制就会接踵而至，并且其中的很多限制必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被一再改动。这种权力被授予了价格管理局。然而，即使必须由国会以立法形式通过这种限制，也不会从实质上损害其官僚的支配权。国会将被湮没在无数的法案之中，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它的能力所及。国会成员既无时间也缺少信息，去严肃地评估价格管理局各分支机构精心设计的这些

议案。他们只能相信该局的首脑及其雇员，一揽子式地批准法案，或是通过法律授予该局管制价格的权力，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对于国会成员来说，让他们以通常用于思考政策和法律的负责精神和谨慎态度去审视这种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对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创业和消费者至上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议会程序是为其制定法律的一种适当的办法。它们基本上不适合于全能政府统治下的行为。由当局决定胡椒和桔子、照相机和剃刀、领带和纸餐巾价格，宪法的制定者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种政治体制。假如他们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肯定会认为，是由国会还是由官僚机构颁布这些立法，完全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很容易理解，政府管制工商业，同任何形式的立宪民主政府，根本就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独裁的统治方式，并不是偶然的。极权主义和人民的统治水火不容。就算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所有政令都服从他们的“议会”的决定，德国和俄国的情况也不会有所不同。在政府管制工商业的条件下，议会只能是一个由“好好先生”组成的集会。

从官僚管理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这个事实中找毛病，也没有道理。行政官员由选举产生的做法，仅仅对最高行政官员有意义。选民只能在他们了解其政治品格和信念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用这种方式任命大量不熟悉的人，无异于胡闹。公民选举总统、州长或市长是有意义的。假如让他们投票选举成百上千的下级职员，则是无稽之谈。在这种选举中，选民不可能做出选择，他只能批准政党提供给他的名单。以正当方式当选的总统或州长，任命自己的全部助手，或选民对一张名单进行投票，上面列出了选民中意的候选人选定的所有助手的姓名，这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极权主义趋势的反对者说得十分正确，官僚们可以运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随意决定那些对于公民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确实，官员不再是公民的仆人，而是不负责任而又专横的主子和暴君。然而这并不是官僚体制的过错，而是一种新的政府体制的产物，它限制个人料理自己的事情的自由，为政府指派越来越多的任务。罪魁祸首不是官僚体制，而是政治体制。享有主权的人民，仍然能够自由地抛弃这种体制。

另一个事实是，官僚体制对私人工商业和自由创业怀有难以平息的仇恨。但是这种体制的支持者，却把这视为他们最值得赞赏的态度。他们非但不以反对工商业的政策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他们的宗旨就是政府对工商业的全面管制，把希望逃避这种管制的工商业人士一概视为公众的敌人。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仅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这种新政策并没有违反宪法，然而它背离了宪法的精神，它无异于消灭过去数代美国人所珍爱的一切；它肯定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放弃人们习惯上称为民主的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属于美国。但是，在它的支持者看来，这种指责并没有使“进步”趋势信誉扫地。他们以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批评者的眼光看待过去。他们说，美国语言里的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响亮的概念，它代表着扭曲了的贪财行为，它被称颂为一种美德”。这种观念“让那些一心搞钱的人、狡猾的骗子、股票玩家和搜刮国民财富的土匪放手大干。”<sup>①</sup>美国的制度被诅咒为伪

造的“权利法案的民主”，而斯大林的俄国体制，则被慷慨地赞扬为唯一真正的民主。

① W. E. Woodward, *A New American History* (伍德沃德：《新编美国史》) (New York, 1938), p. 808. 我们从这本书的封套上可以读到：“今天，任何有着健全思维、对事实了如指掌的父母都可以发现，贝内迪克特·阿诺德作为其儿子的楷模，总体上要比林肯更令人满意。”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从违背美国精神的官僚统治中看到任何弊端。

目前政治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是，组织社会生活应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为基础，还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公共管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资本主义意味着自由创业、经济事务中的消费者至上以及政治事务中的选民至上。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对个人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管制，以及作为生产管理董事会的政府的不受限制的至上地位。与大众的幻想相反，不存在中间道路，不存在作为可以长久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第三种可能的制度。②公民必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像许多美国人说的那样，在美国和俄国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② 见下文 117-119 页。

在这一对抗中，凡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的人，就必须坦率而直截了当地站在资本主义一边。满足于抨击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某些措施是徒劳的，只去对抗一些附带现象，而不是极权主义的趋势本身，也是没有用处的。仅仅沉迷于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无异于虚度光阴。

### 3. 官僚主义的“进步”观

“进步分子”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把矛头主要指向公司化大企业的官僚化。他们的理由如下：

“过去的企业相对较小。企业家能够监督企业的方方面面，亲自做出一切重要决定。他是全部资本的所有人，或至少是大部分资本的所有人。他本人极为关切自己企业的成功，因此他会尽力提高自己的效率，避免浪费。

“但是，由于不可抗拒的经济集中化趋势，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今天，舞台的主宰者是公司化的大企业。它的所有者缺席，法定所有人，即股东，在管理中没有实际发言权。这一任务被交给了专业管理者。企业是如此之大，各种职能与活动必须分配给各个部门和负责管理的下属。对事务的管理必然变成官僚的管理。

“今天，支持自由企业的人，就像歌颂中世纪手工艺的人一样，过于浪漫了。他们完全错误地把一些曾经属于中小企业的出色素质，赋予了巨型公司。根本不存在把大企业分解为小单位的任何可能。相反，经济权力进一步集中化的倾向必然得势。垄断性的大企业将蜕变为严酷的官僚主义；政府将变成无所不能的企业派阀的傀儡。

“政府责无旁贷，必须采取行动扼制这种管理寡头的权力。对政府严格管制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事情只能如此，只能在不负责任的官僚管理体制的统治和国民政府的统治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推理的诡辩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政府官僚主义的扩张受到的普遍批评，“进步分子”和新



政派回答说，官僚体制根本不限于政府，它是工商业和政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的最广泛的原因是“巨大的组织规模”，③所以它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

③ 参见 Marshall E. Dimock and Howard K. Hyde, *Bureaucracy and Trustee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 (迪莫克和海德：《大企业中的官僚体制和代理人制度》), TNEC Monograph No. 11, p. 36.

本书力求证明，凡是追求利润的企业，无论规模多大，只要它的管理不受政府干预，都不易于变成官僚体制。走向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趋势，并不是企业演化过程所固有的。它是某些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些政策旨在取消利润动机在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中的作用。

在这篇导言中，我们只打算扼要地谈谈大众对企业官僚化的抱怨所涉及的一个问题。人们说，官僚化是由于“缺少有能力、有效率的领袖”引起的。④需要“创造性的领袖”。

④ 参见 Dimock and Hyde, *Loc cit.*, p. 44, 以及他们引用的文章。

在政治事务的领域里，抱怨缺少领袖，是一切独裁制度先驱的典型态度。在他们眼里，民主政府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没有能力产生伟大的 Fuhrers (德语：“领袖”) 或 Duces (意大利语：“领袖”)。

在工商业领域，创造性的领袖表现在调整生产和分配以适应供需条件的变化，以及采纳实用性的技术改进。工商业界的伟人，是能够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的人，他是进步的先驱，为其同胞提供他们过去不知道或出乎意料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可以把他称为领袖，因为他的创新精神和活力，迫使其竞争者要么模仿他的成就，要么离开工商业。他的不知疲倦的发明精神和对创新的喜爱，阻止着所有的工商业机构蜕化为闲散的官僚机构。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不知疲倦的活力和进步精神，这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所固有的。

如果说今天的美国缺少这种创造性的领袖，肯定是言过其实的。美国工商业界许多昔日的英雄依然健在，并且活跃在他们的生意场上。对于年青人的创造性，在发表意见时需要谨慎。正确评估他们的成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真正的天才，是很少被当代人所承认的。

社会无法为培养天才做出任何贡献。创造性的天才不是训练出来的。没有培养创造性的学校。所谓天才，恰恰就是藐视一切教育和规则的人，他离经叛道，在过去无法行走的土地上开辟新的道路。他向来是自我塑造的。他不祈求任何有权势者的支持。不过，政府倒是能够造成某种状态，窒息创造性心灵的努力，阻碍他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这就是今天工商业领域的局面。我们不妨看看所得税吧。过去，一个聪明的新手从事一项新计划，他很贫困，资金无多，并且大部分是靠举债。当最初的成功到来时，他并不增加自己的消费，而是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于是他的生意迅速扩展。他变成了自己那一行的领袖。他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迫使富有的老企业和大公司调整自己的管理，以便应付他的创新带来的新局势。他们不能对他熟视无睹，沉浸于官僚式的疏忽大意之中。面对这个危险的竞争者，他们必须日以继夜地保护自己。假如他们找不到能够对付这个新手、管理他们生意的人，他们只好同他的企业合并，服从他的领导。

但是，今天的所得税吞没了这个新手 80%甚至更多的利润。他无法积累资本；他无法扩大自己的生意。他的企业不可能变成大企业。他不是既得利益的竞争对手。老的企业和公司已经拥有可观的资本。所得税和公司税既阻碍着它们积累更多的资本，同时也阻碍着新手积累资本。他注定只能永远经营一家小企业。已经存在的企业受到保护，聪明的新手威胁不到它们。它们不必惧怕他的竞争。它们以传统的方式、传统的规模维持着自己的生意，就此而言，它们享有真正的特权。⑤当然，它们也被剥夺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税收不断汲取它们的利润，使它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资金用于扩大生意。

⑤ 本书的主题不是税制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因此没有必要讨论遗产税的后果，多年来人们一直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而所得税的上述作用则是一种晚近的现象。

今天，在所有国家的任何成文税法中，征税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阻止新资本的积累以及它能够带来的进步。同样的趋势也见于公共政策的另一些分支。“进步分子”抱怨缺少创造性的工商业领袖，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缺的不是人，而是允许他们运用个人才干的制度。现代政策束缚着创新者的手脚，不亚于中世纪的行会。

#### 4. 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

本书将要说明，官僚体制，以及官僚主义的行事方式，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它们必然存在于对一大片地区享有主权的一切政府的行政机构之中。古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皇帝，都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另一些统治者莫不如此。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是一种不采用官僚和官僚手段在一大片领土上组织政府的尝试。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它造成了政治统一的彻底解体和无政府状态。这些封建领主最初只是官员，服从于中央政府的权力，后来却变成了独立的君主，几乎无休止地相互征战、废除国王、法院和法律。自 15 世纪以来，抑制傲慢的封臣成了欧洲每个国王的主要任务。现代国家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它用官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取代了众多地方王公贵族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一发展的领头人是法国国王。托克维尔早就解释过，波旁王朝如何毫不动摇地致力于消灭强大的封臣和贵族寡头集团的独立地位。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完成了由绝对专制的国王开创的事业。它消灭了肆意妄为的国王，它确立了法律在行政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限制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它没有消灭官僚管理，只是把它置于法制和宪法的基础上。法国 19 世纪的行政系统，是尽可能用法律驯化官僚专权的一种尝试。它成了所有其他自由民族的楷模，除了盎格鲁·萨克逊的普通法地区以外，这些民族急于立法，急于建立文明行政行为的最高合法权威。

被全能政府的鼓吹者赞赏有加的普鲁士行政系统，就其早期的起源而言，仅仅是对法国制度的模仿，但是光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腓特烈二世这位“伟大的”国王，不仅从君主制的法国输入方法，而且输入了实施这些方法的人。他把货物税和关税的管理交给数百名法国官僚组成的一个班子。他任命一个法国人担任邮政总长，任命另一个法国人担任科学院院长。今天的美国人说，官僚主义不是美国货，与此相比，18 世纪的普鲁士人有更充足的理由说，官僚主义不是普鲁士货。

在盎格鲁·萨克逊的普通法国家，行政活动的立法手段大大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人和美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防止行政专权的最有效的保护。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证明，没有任何法律防范手段，足以抵挡一种受到强大意识形态支持的潮流。政府干预工商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流行观念，已经动摇了由二十代盎格鲁·萨克逊人为阻挡专横统治的洪水而筑起的大坝。许多知识分子和无数的选民，组织起了农业和劳工压力集团，他们轻蔑地把美国的政治体制称为“财阀政治”，他们渴望采用俄国的方式，它不为个人提供任何保护手段用来对抗当局的专断权力。

极权主义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它是让个人的全部生活、工作和休闲，服从于当权者的命令。它把人贬低为一架无所不在的强制机器上的齿轮。它强迫个人放弃一切未得到政府允许的活动。它不容忍任何异见。就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它把社会改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或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改造成了一座监狱。不管怎么说，它是与文明民族过去遵循的生活方式的彻底决裂。它不仅是人类向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归，如黑格尔所说，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所有人都是奴隶，然而亚洲的君王并不干涉臣民的日常事务。每个农民、牧民和工匠，都保留着自己的一片活动领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受国王及其臣僚的侵扰。在自己的家政和家庭内部，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不同于现代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从摇篮到坟墓，它紧紧地束缚着个人。生活的每时每刻，“同志”都必须默默服从最高权力发布的命令。“国家”既是他的保护人，也是他的雇主。国家决定着他的工作、他的饭碗、他的喜怒哀乐。国家告诉他要想些什么和相信什么。

官僚体制是落实这些计划的帮手。但是，指责官僚个人要对这种体制的罪恶负责，却是不公平的。错误不在于那些供职于官府衙门的男男女女。他们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受害者。是这种体制恶劣，而不是其中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恶劣。没有官僚部门和官僚手段，政府无法运转。没有文明的政府，社会合作也无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官僚统治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厌恶的不是官僚主义本身，而是官僚统治对人类的所有生活和活动领域的入侵。反对官僚体制入侵的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对极权主义独裁的反叛。给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战斗帖上反官僚体制的斗争这个标签是错误的。

然而，在对官僚主义的方式方法的普遍抱怨中，也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因为它们的弊端，也反映着任何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方案的本质缺陷。通过对官僚体制问题的全面研究，我们最终会发现，为何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完全行不通，一旦付诸实践，必然不但造成全体人民的贫困，而且造成社会合作的解体——陷入彻底的混乱。所以说，研究官僚体制，是研究社会组织，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 **5. 选择：利润管理还是官僚管理**

要想知道官僚体制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利润动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资本



主义和官僚体制一样，人们对其基本特征并不了解。因蛊惑人心的宣传而广为传播的各种神话，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完全错误的描述。在提高大众的物质福利上，资本主义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在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人口数量数倍于“工业革命”前夜，这些国家的每个公民享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早期的富人。可是大量的公共舆论却轻蔑地把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凄惨的制度，它对广大的多数人是有害的，只会促进一小撮剥削者的自私的阶级利益。一些政治家，他们的主要业绩就是限制农业产出，竭力为制造技术的进步设置障碍，却把资本主义贬为“匮乏经济”，大谈什么社会主义将要带来的富裕。工会会员开着自己的轿车，他们的领袖却热情颂扬破衣烂衫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称赞工会受到镇压、罢工是刑事犯罪的俄国的工人所享有的自由。

没有必要详细审查这些神话。我们既不想赞扬，也不想谴责。我们要搞清楚这两种制度的真相，它们如何运行，它们如何服务于人民的需要。

尽管官僚体制的含义含糊不清，但是对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处事方式之间的不同之处，似乎存在着一致的看法：公民个人的方式，与管理政府部门和市政的方式。没有人否认，管理警察局所遵循的原则，本质上不同于追求利润的企业所采用的原则。因此，研究一下这两种机构所采用的方式，对它们加以比较，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官僚体制的优劣，它的机制和它的运行，只有通过和利润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的功能机制加以比较，才能得到理解。 ■■

[【返回目录】](#)

## 茅于軾：自由促进了财富的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本文为作者 2012 年（5 月 4 日）获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发表的获奖感言（有删节）。中评周刊-作者授权文稿]



2012 年美国东部时间 5 月 4 日晚，茅于軾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 CATO 研究所 2012 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茅于軾并发表获奖感言；茅于軾在演讲中说：“我把 CATO 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 CATO 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

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统治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 my 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 10 亿增加到 70 亿，平均年龄从 26 岁增加到 68 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 11，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 6.6。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会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 CATO 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䉇

[【返回目录】](#)

## 臧启玉：我为什么要起诉腾讯？

[ 臧启玉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本文转载自 2019-6-23 臧启玉律侠 ]



本文作者臧启玉律师

### 一

文章《腾讯公司无故永久封号，律师沟通无效无奈起诉》发表后，一夜之间阅读量达到十万+，成为网友相互疯传的话题。

我又成为了焦点人物。

相信受过腾讯委屈的网友是很多的，有网友表示对我进行资助，有的提议发动捐款，有的表示愿意组团声援。

没有必要，这是我和有腾讯之间的纠纷，是私怨。

### 二

今天，我来讲述和腾讯的恩怨由来。

腾讯出品个人公众号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让很多草根写手一夜成名，我必须得感谢腾讯和腾讯个人公众号研发者。

中国的网民平均文化水平不高，初期我的文章由于过多运用书面语和学术语言，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读。

毛泽东是很有文化功底的，他的古文写的相当雄壮。但是在他做了领导人之前，文章全部使用口语。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因为他是写给中国广大老百姓看的。

我开始改变写作风格，更多的开始关注老百姓。

文字开始很有受众，每篇文章出来后总能得到较高的阅读量。有的文章当时没有引发关注，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突然被人拾起，快速成为爆文。



2017 年，我写出了上百篇阅读量十万+的文章。包括当年阅读量最大和赞赏量最大的文章。公众号改过很多次名字。名字先后用过臧启玉说法律、一境说法、臧启玉律师。公众号的文章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教育、案件、人生。我是教师出身，经常写关于教育改革的话题，也经常评论典型案件如贾敬龙案、于欢案、明经国案等等。



人生感悟文章还是很受欢迎。《我的高考》、《年届四十，人生过半》、《徐州唯一状元李蟠的凄惨官场人生》。

每天辛苦的写作，终于吸引了全国数十万粉丝的关注。那时候只要我一天不发表文章，便会有粉丝打电话要求：快点写。

人怕成名猪怕壮。我引起了腾讯的关注，有时候是保护性的，有时候是惩罚性的。

2018年中旬，情形明显不对了。腾讯先后永远封禁我的公众号三次。

一次是因为转发人民日报的头篇文章《官场逆淘汰正威胁国家安全》、一篇是国为原文转发光明日报的头篇文章。这两次封禁，我提供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原文给腾讯总部，他们看后二话没说，解除了。

终于到了2018年7月10日，腾讯公司以无中生有的理由将“臧启玉律师”公众号（zqyls333）永久封禁。

涉嫌违规文章名字为《历史的先声——读完我泪流满面》，我们公众号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这篇文章，而且这篇违规文章竟然是新华日报刊发的文章，所有内容为毛泽东的理论。

### 三

以人格保证，我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这篇文章，只要打开后台发表记录，一切将真相大白。目前只有腾讯有这个权限。

申诉！因为有前两次申诉成功的经验，相信腾讯会给一个说法的。

这次，我太天真了。

开始给腾讯总部写信。因为之前我代表别人申诉，也有成功过。

第二天信件就到了腾讯总部。打电话联系我的是一个女员工，她问我这篇文章到底是哪一天发表的，我告诉她从来就没有正式发表过。她也惊讶，是啊，我们找不到这篇文章啊。

她说研究后再给我回复。然而事后一直再没有回音。

我开始和腾讯法务部联系，在我给腾讯写过六封快递，两封给总部，一封给马化腾，三封给法务部。

我认为，腾讯这么大一家公司，一定会有一批由律师组成的法务部，里面一定法学人才众多，他们会以事实为依据，调查清楚，最终给我一个说法。

然而我又一次天真了。

腾讯法务部根本就不理睬用户的诉求。

用肉包子打狗，狗也会追上去闻闻。我的信件他们收到后，是不是拆也没有拆，不得而知。

判处一个人死刑，也是要有判决书的。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我的公众号有没有违法，违了哪门子法。

法治社会，首先政府要守法，执法人员要守法，法律工作者要守法。如果身为一名律师违法，还怎么去从事法律工作，怎么去教导别人要守法。

人生大耻。

#### 四

该努力的都努力了，沟通无效。

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只有相信法律。

1/1

## 封帖封号涉嫌犯罪

——广东法院给网警及腾讯普法

**（摘自下文）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法院还认为，并非所有对府具有负面影响的帖子，均系违法或侵权的，根据法律精神和法行政的要求，政府亦有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网络媒体的监督属于社会监督的形式之一，正常的监督能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服务质量。**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刘素华表示，‘如果删除公民常监督发的贴，就把公民的监督权给堵住了，是破坏法治的一行为，也与法律背道而驰。’网站上的帖子是否涉嫌违法，是侵犯个人或企事业单位的私权利，是否能够被删除，这需要法经过审理判决后做出裁定和判决后决定，不是网警个人能利职权决定。’

李孝霖表示，这也是法律于私权力的一种保护。李孝霖为，对于私权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公权领域，法无授权即禁止，但目前网络警察的一些执法行为，并没有针对性的法授权，也不能出现这样的法律授权，‘这样就可能造成网警权的滥用，并使其以此寻租获利，这是现有政策所不能监督和制的，只有公安自己内部的规范所约束。’

我决定拿起法律武器起诉腾讯。作为律师，我深深的知道，打官司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和腾讯这样的有背景的大公司打官司，胜率微乎其微。

我向深圳南山法院递交了诉状。

在我起诉腾讯之前，我查询到很多用户提起过诉讼，没有找到一起胜诉记录，深圳一名律师代理

用户起诉腾讯，根本就不受案。福建有一个用户起诉腾讯，充分利用法律程序，腾讯只好在当地请律师应诉四次。

南山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立案号为民初 2019 粤 0305 号，法官同时要求我在网上立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这是适应网络办公的需要，我会积极配合。


## 五

2019 年下半年，我不再接受案件，尽全力和腾讯打这场官司。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自损三千，也要杀它八百。

法治社会，我相信法律，我要用司法判决给民众一个说法，倒底是权大还是法大。

谨以此文，怀念过去无数写作的黑夜和白天。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远逝的青春，作一次留恋的回首。

谨以此文，致谢曾经关注和赞赏过我们公众号的朋友。 

[【返回目录】](#)



## 王晓云：“这才是我的国”，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 本文转载自 2019-6-24 公众号：以色列计划。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以色列军队中服役的阿拉伯士兵，大多是居住在以色列北部高地的德鲁兹教派，友善的德鲁兹人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独立教派，德鲁兹派的教义受到基督教和诺斯底主义等影响，被伊斯兰正统教派视为异端

以色列有着近 200 万的阿拉伯以色列公民，他们虽然大多数是穆斯林，但却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非常不同，他们中不乏以色列的强烈支持者，一些阿拉伯人甚至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担任保家卫国的行动中。近日，一名 19 岁的阿拉伯以色列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并表示为以色列而自豪。

以色列军方接收了这位阿拉伯青年加入 IDF 的边防部队，并将按照其志愿派他前往最危险的约旦河西岸边境执勤。以色列特有的社会文化正在发挥凝聚力作用，像这样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士兵已经比六年前增加了六倍。

### 隐瞒周围阿拉伯邻居

19 岁的阿里（化名）和母亲生活在耶路撒冷，四个月前，这位以色列高中生被边境警察部队录用，从而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队中的一名阿拉伯裔军人。

阿里参军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阿拉伯社区的对立氛围令他母亲非常纠结不安，这位妈妈几个月来与街坊提起长期外出的儿子时，均以“孩子去上大学了”为托辞搪塞。阿里自己虽不怕什么危险，但

他担心有阿拉伯同胞对妈妈不利，所以格外小心严守加入以色列军队的秘密。

按照以军休假制度，阿里每两周回家探亲一次，匆匆离开训练基地时，他也像其他士兵一样穿着卡其色军服。但阿里赶到特拉维夫中央车站后，就得找洗手间迅速换上便装，才敢打电话叫发小开车接他回耶路撒冷。



参加边境骚乱场景模拟训练的**阿里**（化名），以军为了保护他的家人，隐匿了其真实姓名和面容



身穿制服的以军士兵赶着周末休假，但**阿里**必须先换掉军装再回社区

其实，按照以色列兵役法，只有犹太裔青年男女必须服兵役，阿拉伯裔完全无需承担这项收入微



薄的艰苦义务。阿里的秘密只有几个发小和至亲知悉，但军中的新世界已足令年轻人向往，三位同龄朋友效仿投军。

### 执意加入最危险的兵种

阿里出生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阿拉伯家庭，4岁时全家搬到耶路撒冷。2010年，阿里的父亲因癌症去世，11岁的少年不得不撑起整个家庭，在耶路撒冷的旅店打工当侍应生，最终靠以色列政府给母亲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度过难关。



**埃莉诺·约瑟夫** [Elinor Joseph] 是第一位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的阿拉伯裔女兵，  
军事强国以色列，现役国防军 17.6 万人，其中女兵 5 万余人，约占三分之一

由此，阿里决心成年后投身军旅，回报以色列社会。2018 年秋加入边境警察部队后，由于阿里是家中独子，边境警察又是以色列出名繁重高危的部队，军方曾反复与其母沟通风险，直到母亲签署同意书，方获准他前往西岸边境参加防暴和反恐执勤，并避开在家门口被熟人撞破的可能。以色列边境警察承担了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边境等新闻热点地区的防暴巡逻任务。

阿里一家的境遇并不是个案。阿以冲突七十年，新闻中只看到巴以两家的对立，很少关注巴以普通国民的生活。巴以和谈后，巴方控制的加沙地区以色列人全被迁走，西岸地区持续排斥甚至袭杀犹太居民，以达到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目的。但以色列 800 万人口中，却仍然生活着同属阿拉伯裔的 200



万以色列公民。

### 以色列多民族的共存

作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小国，在备受战火和暴恐考验的同时,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等小族群和教派享有所有以色列人的同等权利，在就学、就业、福利方面力争一视同仁,共同为社会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使得弹丸之地的以色列成为人均 GDP 逾 4 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基督徒、穆斯林担任将校、法官、议员、市长乃至内阁部长的情况屡见不鲜。



## 以色列教育家：從小這樣教育孩子 國家便沒有被政客蒙騙的愚民

以色列人口 868 万，却有 14 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人均诺贝尔奖获奖者最多的国家，  
以国教育注重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以避免国家被少数立心不良者操弄，  
以色列被视为中东世界中经济发达、商业自由、新闻自由和社会整体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十年前报名参军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只有十数人，而眼下每年以军征召的阿拉伯义务兵人数已经有数百人。这些千禧一代有更好的眼界和教育背景，坚信自己有责任保卫家园的和平，因为脚下就是自己的祖国。 🇮🇱

[【返回目录】](#)

## 洞主：《巨婴国》究竟讲了什么？如何评价这本书？

[洞主 媒体运营经理。本文首发于 2018-12-14 公众号「洞穴笔记」。原题：《巨婴国》被禁，它究竟讲了什么？如何评价这本书？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巨婴国》这本书一直备受争议。

2016 年 12 月，《巨婴国》上市伊始，就被媒体人罗振宇、作家张德芬等知名人士极力推荐。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视频节目《罗辑思维》，专门用一整期节目，来介绍这本书。

而与此同时，由于《巨婴国》的主要观点，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中的孝道文化，让不少人读后，并不“舒服”，因此它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猛烈抨击。

当然，很多人知道《巨婴国》，也许是因为它被禁。2017 年 2 月 17 日，这本书刚刚卖了 3 个月，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其出版公司）向相关经销单位发出了《下架通知函》，称“《巨婴国》一书因质量不合格，现通知下架召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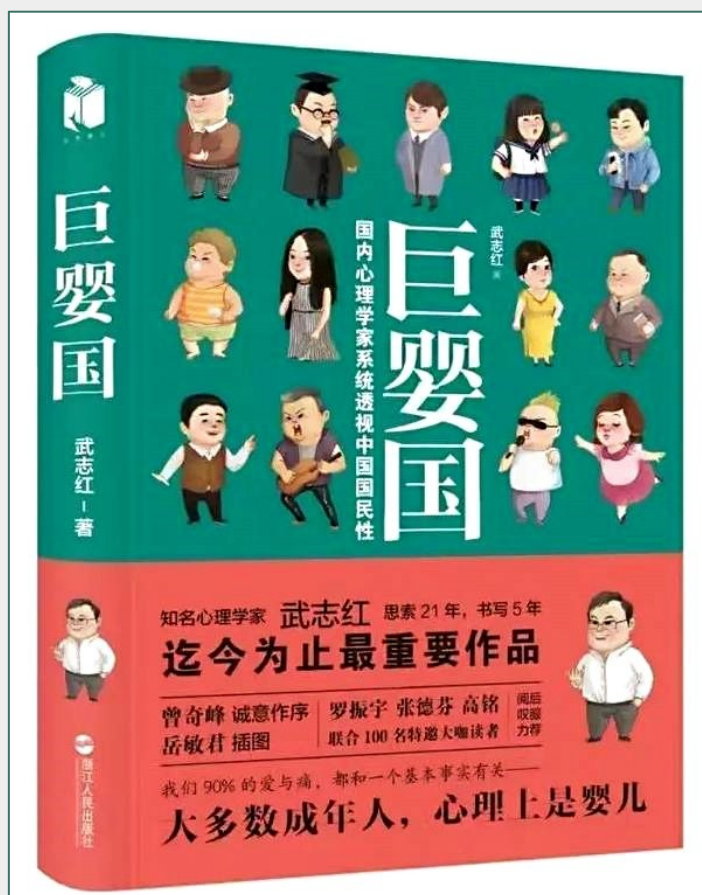
明眼人肯定明白，“质量原因”只是一个幌子。《巨婴国》下架后没多久，就有细心的读者发现，《罗辑思维》专门介绍这本书的第 198 期节目不见了，且全网无法搜到。这当然是“质量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那么，《巨婴国》究竟讲了什么？

## 1. 大多数成年人 心理上是婴儿

其实，《巨婴国》全书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我们 90% 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大多数成年人，心理上是婴儿。

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本书作者武志红。武志红是现今较为知名的心理学家，在网络上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他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算得上是科班出身。



《巨婴国》 武志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出版

据武志红自己说，写《巨婴国》这本书，前后思索了 21 年，写了 5 年，他早在读大二时，心里就埋藏了一个很强的意愿，那就是，搞明白中国人的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具体来说，武志红想弄明白，中国人从家庭到社会，诸多方面都离不开传统孝道，而在孝道文化之下，却存在着太多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比如家庭束缚之下，孩子因抑郁而自杀，比如恶劣的婆媳关系，导致媳妇必须承受一辈子的委屈等等，武志红觉得，种种现象背后，应该有一个根本原因，多年后，他找到了这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大多数成年人，心理上是婴儿，武志红将这种人称为“巨婴”，他认为，如果这样的人过多，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婴国”。

关于“巨婴”这一概念是怎么来的，作者在书中说，有一次他看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其中有一个情节：一位军需官去妓院嫖娼，嫖娼的对象是一名 17 岁的年轻姑娘，不过，这位军需官并



没有直接和姑娘颠鸾倒凤，而是让姑娘先给他打洗脚水洗脚，然后为他擦身子，等他自己被伺候舒服了，才开始和姑娘缠绵。



**武志红**，心理咨询师，作家，北京大学心理系临床心理学专业硕士，导师是国内著名的心理治疗学家**钱铭怡**，其微博粉丝超 155 万、微信公众号头条文章篇篇十万加，其代表作《巨婴国》凭借“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上都是婴儿”的核心观点卖出极高销量

看到这个情节，武志红很奇怪，因为在他看过的西方电影里，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大开眼界》中，西方男女搞那事，就纯粹是性交易，抛开道德与否，西方男女“上床”，属于成年人的行为模式，而反观中国电影《一九四二》，军需官让姑娘伺候他的这些行为，就像是一个手脚还不灵便的婴儿，他在让周围人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呵护。

作者武志红由此进行联想和延伸，发现**中国的很多成年人，日常行为中还带着婴孩般的行为特征，而这些日常行为，往往带来负面结果。**

比如流行一时的“妈宝男”，就是说男人 30 多岁，甚至找了老婆，但还是要和妈妈睡在一起，一切都听妈妈的，完全没有主见。

再比如，作者认为，那些老人“讹诈”扶助者的事件，根本上，是由于老人心态上是婴儿，你看婴儿床里的小 baby，TA 会觉得世界是按照自己意愿运行的，所以 TA 想喝奶时必须有奶，想抱抱时



就得有人抱抱，而一旦外界没有马上满足 TA 的想法，TA 就会生气和哭闹。这根本上是因为，婴儿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TA 无法接受世界不被自己掌控的无助感。所以，摔倒的老人把责任推给身边人，潜意识里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世界还是掌控在自己手中，摔倒是由于外界的邪恶元素，与自己控制世界的能力无关，毕竟，自己是全能的。

作者武志红提出的“巨婴”概念，主要说的就是成人的这种婴孩般的心理结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这里多说一点，这种根据婴儿时期特点来分析行为的思考方式，其实早在弗洛伊德时期，已经很流行了，这种思考方式，在心理学上，归属于精神分析流派。

这里需要了解的是，精神分析流派，并非心理学中的科学，也就是说，其中许多观点和结论，虽然有大量临床案例支持，但仍然不具有“ $2+2=4$ ”的严谨性。就比如精神分析流派中的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在 0-6 个月的口欲期结束后，会进入肛欲期，这时婴儿的主要快感集中于肛门，他们具有涂抹大便的冲动，而这之后，人类成长过程中对于绘画的冲动，就由此而来。

所以说，有些精神分析的言论，更像是假想，不能太当真，那么同样，回到《巨婴国》这本书，它也遵循着精神分析流派的思维，所以**读这本书，理智的选择是：从中得到启发，而不是完全相信它。**

在《巨婴国》一书中，**作者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巨婴”现象十分严重，并通过“巨婴”现象，重新看待集体主义与中国孝道文化**，还针对一些案例，提出了解决方案。

如果细读《巨婴国》，你会发现，虽然书中案例颇多，但并非随意堆砌。可以看出，作者武志红并不满足于用表面的“巨婴”现象，来解释案例中的问题，他希望沿着“巨婴”再往下深挖一些。

## 2.「巨婴」心理的两大特征：共生与全能自恋

从表面的“巨婴”概念深入下去，**武志红概括了“巨婴”心理的两大特征：共生与全能自恋。**

### ① 共生

先说共生。婴儿在 0-6 个月，和妈妈属于共生关系，这被称为母婴共同体。**这时候的婴儿，会觉得自己和妈妈是一体的，是一个人，TA 会把母亲的乳房当作自己的，把母亲的一切当作是自己的。所以，这时的婴儿不会关心妈妈，也不会感受妈妈是高兴还是悲伤，因为 TA 不觉得母亲是自己身体之外的一个人。**

武志红认为，现今这种共生现象，远不止于母婴，在成人世界，母子共生、父子共生、夫妻共生等等，已经成为中国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

之前说到的“妈宝男”，就属于母子共生，另外，为什么许多婆婆不喜欢儿子娶的媳妇，那是因为，婆婆在“巨婴”心理的作用下，会觉得儿子是自己的，当儿子娶了媳妇，对她来说，就是媳妇抢

走了自己的儿子。而且，婆婆欺负了媳妇，并让儿子处于困扰中时，婆婆也不会体谅儿子的感受，因为她从没有把儿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不会像尊重一个独立个体一样去尊重儿子，她心里会想，既然儿子是我的，那我說什麼，他就得听什麼，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这种“共生”特征，往往不会只体现在家中个别人身上，它往往是一个集体现象。如果一个家庭中，多数人都具有“共生”的特生，那么父母会理所当然地把儿女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儿女对他们来说，是可控的，同时，儿女们也不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一旦违背并发生了冲突，不论事实谁对谁错，那必然是儿女不孝，而父母永远是权威的代表。

这里，孝道出现了，在武志红看来，**我们的孝道文化，是用来维系这种“巨婴”状态的**，根据作者的研究，“孝”的本质是“顺”，孝道文化无形中要求儿女对父母的顺从。如果你看过《礼记》、《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你就会发现，孝道文化下，父母胜过真理。当然，作者并没有全盘否定孝道文化，作者的意思是，我们的孝道文化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愚孝”。

这样的文化，支持着父母掌控孩子的逻辑，维持着父子、母子的共生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在一些特殊年代，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极为繁荣，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共生。**按照那些年代的要求，你做的任何行为，都要先考虑集体利益，你的任何思想，都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因为，你自己和其他人是一体的，你不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也就不存在独立思考的前提。

关于此，书中多次引用作家王小波说的一个故事：洪水来了，一名青年为抢救集体的一根电线杆，被淹死了，事后大家展开大辩论，争论这名青年值不值得这样做，最后上头说，别说是电线杆，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都值得这样去抢救……其中意味，不多说了。

成人状态里的共生，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自我，TA 必然受到长辈或群体意志的支配，或者，成为面目狰狞的支配者。

## ② 全能自恋

再说说全能自恋。**武志红将“巨婴”心理的全能自恋特征概括为：我一动念头，世界就得立即按照我的意愿运行；如果世界不按照我的想法来，我就会愤怒，甚至大哭大闹。**

与之类似，心理学家克莱因更具象地表达了这一特征：婴儿会感觉，妈妈是 TA 创造的，妈妈的乳房也是 TA 创造的，TA 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也可以无情地毁灭她。

基于这一心理特征，许多人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任何事情如果不能达到预期，TA 就会感到生气，并认为那是别人的过错，绝不会是自己的问题，毕竟，自己是全能的嘛。

武志红说，自己曾经认识一个高中女生，这个女生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后，会想死。她就算考第一也是如此，唯独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她门门课都考了年级第一。武志红问这位女生：你好像觉得自己应该是完美的？不料女生反问说：难道我不是完美的吗？

其实，很多人内心深处都含有这种全能自恋倾向，这种全能自恋不同于自负，它不仅觉得自身完美，更关键的是，它不接受不完美，一旦面临不完美，就会觉得那是由于其他人的恶意造成的。全能自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所谓被迫害妄想症，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极其伟大，如果说现实中他没那么伟大，那只能是因为，有一个强大而邪恶的幕后敌人，处处陷害并遏制他的行为。

在武志红看来，**全能自恋的特征，在国人中发展为了两个极端：一种人成为保留全能自恋的巨婴，另一种人严重压抑了自己全能自恋的心理。**

于是，在中国家庭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循环，那就是，一个人，从小时候到长大成人，一直对父母言听计从，完全压抑自己内心那种“谁也管不了我”的全能心态，可是，等到TA为人父母，TA就会完全释放曾经的压抑，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展现出自身无所不能的状态。进而，TA的孩子接着进入了这个循环。

在这里，孝道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将这种循环合理化，它告诉家庭，父母是权威，父母想做什么，儿女都得顺着来。

将全能自恋特征延伸到社会，作者武志红认为，**之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总斗不过太监，那是因为太监甘愿做皇帝指令的绝对执行者，由于大多数君王是“巨婴”，所以他们最需要的，永远是能够任由他们摆布的阉人——只有太监那种无限制地讨好与顺从，才能让皇帝感受到自己的无所不能。**

其他人的顺从，最让“巨婴”开心，也最能让“巨婴”体会到自己的全能；那些说真话的大臣，只会让“巨婴”觉得我的想法受到了拦阻，无法为所欲为，那么“巨婴”当然会愤怒，当然不会听那些谏言的大臣，甚至还要杀之。

### 3. 如何避免成为「巨婴」

要知道，人的心理结构深邃而复杂，因此，对于心理结构病理的改善，很难有标准化的方案。

关于如何避免成为“巨婴”，作者武志红并没有太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过，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指导方向。

“巨婴”心理很多是在婴孩时期逐步形成的，武志红告诉我们，许多客体心理学家都讲到一点：**对幼童来说，家长应该及时对孩子进行回应，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婴儿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外界的回应，慢慢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分异，慢慢知道妈妈以及周围一切，与自己不是一体的。只有真正懂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包括内心潜意识的懂得），才能尊重自己以外的人和世界，才能摆脱全能自恋以及共生的心理状态。

对此，作者武志红引用了一位女性网友的故事：

儿子和外婆玩，我就去洗脸。他疯得很高兴，突然跑来说：妈妈，妈妈。我对他说：

嗯，妈妈在洗脸。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想告诉我他很高兴。我说：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他

“嗯”了一下，就自己跑开了。

婴儿最初都具有全能自恋的心态，他们觉得，我饿了，就得有奶到嘴边，我困了，就得舒舒服服地被安置到床上，但是，他们与世界接触的方式，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笑一下，或者摸摸妈妈的脸颊，这时候，外界的反应就变得及其重要。当婴儿在表达了某种模糊的心境之后，如果总能得到妈妈或外界的反应，那么 TA 将渐渐明白，TA 与外界，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互动的关系。

假如，婴儿除了吃穿，很少得到反应，那么他的潜意识就会慢慢觉得，我与妈妈是一体的，世界本该是围绕我运转的（吃穿的满足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肯定有某种势力邪恶地影响着我（得不到其他反应印证了这一点），我很恼火。

这样，婴儿长大后很可能成为“巨婴”，TA 将会通过共生和全能自恋的心理，试图控制一切，以此狠狠发泄婴儿时期积郁的恼火，如若不能实现，那 TA 就会极力遏制自己的共生和全能自恋心理，直到有一天 TA 成为长辈或手握权力，进而发泄那积郁已久的恼火。因此，如果为人父母，如果有孩子，还是多与孩子互动，多回应 TA 吧。

另外，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有“巨婴”倾向怎么办呢？作者武志红的答案是，**尽可能做真实的、独立的自己，而不是做传统孝道文化下的“好人”**。

这里需要先说明，作者看来，所谓孝道文化下的“好人”，或者说“中国式好人”，是指那种对身边人笑颜相待，甚至讨好周围一切人，对父母百依百顺，但却很少按照自己真实想法行动的人。

这种人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模范，因为 TA 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但实际上，TA 的迎合和顺从，一方面可能助长了周围人的“巨婴”心态，更重要的是，被 TA 自己压抑在心底的正当欲望，很可能在日后爆发，那时，TA 可能面对晚辈，可能面对下级，TA 会随意命令和摆布他人。

武志红认为，成年人若要成为真实且独立的自己，需要时常提醒自己这两句：

第一，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无需证明，我对你好，但不期待你如何回应我，也不控制你；

第二，我接受我有坏的部分，甚至喜欢这份坏，所以我不装自己有多好，所以你也不必装。

**对此，我认为核心是三点，一是自信，二是不装，三是不控制别人。**

#### 4. 如何看待《巨婴国》

对我而言，《巨婴国》这本书更多的是启发。我们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确实有长者为尊的内涵，这当然没有错。



但是，《巨婴国》提示我们，孝，不该意味着无条件顺从，假如父母的要求或控制欲过了度，我们就该停下来想一想，是否还要顺从；如果自己为人父母，也可以用“巨婴”的概念衡量一下自己，需要明白的是，为人父母，也不意味着可以滥用长辈的威严；如果在社会上，在某种等级秩序之下，我们需要警醒，一些权力的运用，是否只是“巨婴”心态的发泄。

可以说，《巨婴国》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质疑，为我们曾经可能深信不疑的部分伦理，提供了重新反思的可能。它带来的，更多是一种视角，一种思维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巨婴国》当然是有价值的。

不过“巨婴”的说法，从根本上说，就如同精神分析流派中的许多概念一般，无法用科学的理论加以证实，而且，由于“巨婴”概念有些模棱两可，因此书中不少支撑观点的事例，都有被牵强套用之嫌。如果用严谨的学术眼光看待《巨婴国》，它当然是不够格的。

总而言之，《巨婴国》达不到一般意义上社科类书籍的层次，但它可以算是某种个性化观点，对传统孝道文化壁垒的一次突击。 🍷

[【返回目录】](#)

## 向京：为什么要谈女性艺术？

[ **向京** 雕塑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雕塑工作室教师。2016 年 8 月 23 日 hi 艺术向京专栏。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本文作者**向京**

每次要谈到女性艺术都会让我有种本能的不情愿，聪明的女性艺术家都应该拒绝关于性别的讨论。语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有歧义，我始终觉得“女性主义”甚至是“女性艺术”这样的词汇，在中国的现时文化里是个伪问题。如果只是把同一性别的艺术家凑一起就叫做女性艺术，实际是缺乏问题的针对性的。

中国的女性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一个差异巨大、背景复杂的社会里，中国的女性问题怎么谈？中国的“女性艺术”怎么谈？从什么角度谈？为什么中国的女性艺术家这么少？如果问到中国的女性艺术家是不是女性主义者，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会否认？为什么我们单单要把女性创作拿出来讨论？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曾经给我很大启示，她说过：“如果性别是男女不平等的性化（sexualization）所采用的凝固不变的形式，那么，不平等的性化就先于性别出现，而性别则是其结果”[朱迪斯·巴特勒. 消解性别.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4.]。

我曾经参加过在一个在比利时举办的中国女性艺术家联展，展览充斥着织物、丝绸、桃红、粉红这些元素。不管是男性策展人，还是女性策展人，碰到做女性的展览，头脑里的“定义”便会即时苏醒。当

你做一件作品，观者的潜台词也常常是——哦，因为你是女性，中国的女性，所以这样创作。在艺术圈，几乎每个女性艺术家都会被介绍为“重要的女艺术家”。“女”这一前缀似乎时刻提醒着你的边缘性。而创作者寻求自我建构的本能总是与这样不离不弃的身份标签对抗着。



**朱迪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1956.2.24— ]

美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学者，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系，她被誉为“现代政治理论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

朱迪斯·巴特勒还说过，把女人等同于性别，是把女人这个范畴与她们的身体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绝给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理当是男性所享受的一样。[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6。]这一观点的女性主义火药味就很浓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同样的女性问题是无法做到“微观化”的。因“微观化”的前提是先从社会整体状况和历史视角上去理解和讨论“中国式”女性问题的成因和现实，所有局部的孤立问题的讨论都不具备说服力。然而，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也在不断被规训的过程中缓慢地唤醒了关于性别的自觉意识，并且几乎无可回避地“冒险”涉入了关于女性身份问题的讨论。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女性注定是身体性动物。借由身体感知和思考，这种身体性肯定带来很多的局限，这种认知近似于被称作“本质主义者”的第一代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她们更积极坚决地由此推动揭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方式”。

为什么女性总是更愿意用身体作为创作的素材？一方面和这种身体性的属性有关，女性更倾向把身体作为感知的媒介和世界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在文化里始终是被客体化的，被观看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著名的《观看之道》里写道：“我们也许可以这么简单地说：男性行动，而女性显现。女性观看被观看的自己。这不仅仅决定了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大部分，也决定了女性看待

她们自己的关系。女性自身中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其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



**路易丝·布尔乔亚** [ Louise Bourgeois 1911-2010 ]

法裔美国雕塑家、画家、批评家与作家



**布尔乔亚**的大型户外雕塑作品，其作品常与潜意识和童年记忆关联，中晚年是其创作爆发期，她对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还有包含文化上顽固的意识形态的因素。用女性身体创作，是双刃剑，一方面你要利用身体这个“利器”对抗这种观看上的习惯和眼光，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这样的创



作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女性的身体只要出现，就会很容易被文化习惯消费掉。



墨西哥著名女性主义艺术家 **弗瑞达·卡罗** [ Frida Kahlo 1907—1954 ]  
18岁时因遇车祸失去健康，画作大多躺在床上完成，也因此导致她过早离世，  
生命的最后一年举办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墨西哥

身体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情感。女性创作普遍具有自传性的表达倾向，这也是身体经验的思维习惯。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她那篇著名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里，否定由性别所划分的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反对艺术是个体情绪经验的直接表达，或是把私人生活翻译成视觉形象。诺克林所批驳的还有诸如“由于社会属性的边缘化，内向的方向似乎是女性天然的觉悟”这类的观点。然而内化是创作思考中的重要过程，太多伟大的创作者，都经历了强大的内化过程，不分男女。尽管我一向不认为我的创作带有自传倾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视角观看自己，但我很认可对女性艺术的这个评价；并且深层次里，我绕不开身份话题，也和这样的视角圆心有关——所谓“看世界都是透过我的眼光”这样的论点已经暴露无遗。那么自传性的特征由何而来？除了身体媒介是女性创作者的重要依赖的因素，我还是觉得在中国文化范围里，女性处在更边缘的社会角色，而

因此获得了更多自省（至少是自我观照）的机会；社会凝视也让女性更习惯观察自我以及同性的群体，并由此获得自我确认，而自我觉悟也常常是在这样的功课里完成的。



毕加索见了**弗瑞达·卡罗**著名的《戴荆棘和蜂鸟项链的自画像》（左）也自叹不如；  
**卡罗**作品的色彩明艳而浓郁，迄今在门类艺术、时尚（右）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自我”总是个存在的重要命题。现代的网络环境造就了“自我意识”的文化，但这个自我并不代表真正的主体性。而生物性的性别意识也不能造就我们的主体性，甚至会被消费文化消解，制造同质化的人，削弱需要内化来建构的自我。

归根结底，所有问题都是创作的问题，是探索主体性的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最终解决创作问题，还是要超越个体的经验，达成对作为生存背景的社会性话题的介入，对权力机制的思考，才能获得真正的主体自觉意识。我始终反对无休止地纠缠在圆点上，应该把“我”放在文化上，放在权力系统里去理解，才能获得“我”的坐标，对作为社会和文化构成的女性“身份”进行切实思考，切入生存的实质问题。 ■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6 年 11 月，「如何依宪规范执法问题」研讨会，围绕基层警察违法滥用暴力、粗暴执法的事件展开讨论。参会专家包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宋立律师，天则所法治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蒋豪主任，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先生等。
- 2017 年 12 月，「美国减税与国家竞争」学术沙龙，解读美国减税举措的影响，分析我国财税制度改革方向。参会学者包括：著名财税专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经济学家秦思道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教授等。
- 2018 年 4 月，「税负与产权」云豹沙龙，聚焦税负与政府职能的关系，阐明私人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参会学者包括：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独立学者子衿，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经济学家秦思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等。
- 2018 年 5 月，「表达自由与程序正义」云豹沙龙，解读鸿茅药酒案，关注表达自由的司法保护与实践。参会学者包括：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经济学家秦思道，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等。
- 2018 年 7 月，「人工智能与道德风险」云豹沙龙，讨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利弊与伦理冲突。参会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政治学家王焱，经济学学者宁越，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3 万元（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